

F e n g q i Z h i h u i S h u o T a n x i



冯契“智慧”说探析

王向清 李伏清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F e n g q i Z h i h u i S h u o T a n x i



冯契“智慧”说探析

王向清 李伏清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封面设计:吴燕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契“智慧”说探析/王向清 李伏清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01-011422-4

I. ①冯… II. ①王…②李… III. ①冯契(1915~1995)-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2894 号

冯契“智慧”说探析

FENGQI“ZHIHUI”SHUO TANXI

王向清 李伏清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710×1000 1/16 印张:21 25

字数:345千字 印数:0,001-3,000册

ISBN 978-7-01-011422-4 定价:49.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250042

序

20 世纪的下半叶,中国的哲学界虽然并不沉寂,但却很少有真正自成一系的哲学家。然而,在那个时代,冯契先生(1915—1995)却以其深沉的思辨和吞吐百家的气度,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独树一帜。与历史上一切真正的哲人一样,冯先生毕生从事的,是智慧的探索。直到其生命的最后日子,他依然没有中断哲学的思考。自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契先生既历经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沉思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从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先生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为中国当代哲学留下了一个创造性的体系。

以智慧的探索为中心,冯契先生的哲学思考涉及中国哲学史、认识论、价值论、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等各个领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其代表作是三卷本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一卷本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如书名所示,冯契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考察,侧重于揭示中国古代哲学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及科学的比较方法,冯契先生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演进的历史脉络及其中的逻辑环节,并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特点做了深入的分析。冯契先生对认识论做了广义的理解,认为它包括如下四个问题:第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第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或者说,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第三,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宇宙发展法则)?第四,人能否获得自由,或者说,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养?在冯契先生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在关注前两个问题的同时,又对后两个问题做了更多的考察: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的问题,发端于先秦的名实之辨;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发端于先秦的天人之辨,二者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正是在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

上,显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就名实之辨而言,冯契先生认为相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较早地发展了辩证逻辑;每当中国达到总结阶段时,就有哲学家或逻辑学家对辩证思维的形式进行考察,提出辩证逻辑的原理,在先秦哲学的总结阶段,《荀子》、《易传》、《黄帝内经》初步形成辩证逻辑的系统,到宋明,从沈括、张载到王夫之、黄宗羲,辩证逻辑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冯契先生进而指出,与辩证逻辑的早期发展相应,中国较早地发展了辩证法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以气一元论为基础,将道理解为阴阳的对立统一。辩证逻辑与辩证的自然观对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做了肯定的回答和多方面的考察。冯契先生的这一看法不同于所谓中国人“重人生轻自然、长于伦理而忽视逻辑”的流行之论,它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对中国传统认识论和自然观的理解。

在人的自由问题上,冯契先生认为,相对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更多地考察了自觉的原则,而对自愿原则则有所忽视,后者容易导向宿命论。冯契先生对正统儒学的宿命论倾向做了深入的分析。按冯契先生的看法,自由不仅是伦理学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美学。在美学上,冯契先生指出:西方人比较早地提出了美学上的模仿说(再现说)和典型性格理论,而中国人则比较早地发展了美学上的言志说(表现说)和意境理论。冯契先生的这些看法基于对中国哲学的长期沉思,它将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关于中国近代哲学,有见于其剧烈变革的社会历史前提,冯契先生研究的侧重之点主要在于其“革命进程”。按照冯契先生的看法,中国近代哲学以“古今中西”之争为其背景,具体围绕着如下四个问题展开,即历史观、认识论、逻辑和方法论、人的自由和理想。这些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理气(道器)之辨、心物知行之辨、名实之辨、天人之辨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同时又受到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随着进化论的输入,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开始拉开帷幕,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则使哲学革命由进化论阶段发展到唯物辩证法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历史观与认识论的论争逐渐结合起来,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主线,最后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做了总结;逻辑与方法论及人的自由和理想的论争,在中国近代未能作出系统总结,冯契先生由此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哲学革命”的问题。这些考察,既清晰地梳理了中国近代哲学演进的脉络,又将近代哲学的变迁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联系起来,使历

史的考察成为哲学重建的起点。

哲学史与哲学的统一,是体现于冯契先生哲学研究过程的一个基本原则。对以往哲学的考察,总是处处渗入他的哲学见解,而他的哲学思考,又伴随着对以往哲学智慧的总结。这种总结,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智慧说三篇》中。《智慧说三篇》由三部相互联系的著作构成,这三部著作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早在青年时代,冯先生便“真正感受到自己有一个哲学问题非要解决不可”,这个问题就是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如前所述,冯契先生对认识论做了广义的理解,认为它不应限于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而且应研究智慧的学说,要讨论元学(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这里既涉及具体经验领域的知识,又涉及关于性与天道的智慧,元学与知识论统一于广义的认识论。

按冯契先生的理解,广义的认识过程包括两个飞跃,即从无知到知的飞跃和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由无知到知的过程发端于实践中获得的感觉,这种感觉能够给予客观实在。冯契先生认为知识经验领域无非是以得自经验者还治经验,得自经验者即是概念,用概念来摹写和规范经验,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由此形成了知识经验。作为知识经验主体的“我”,运用逻辑范畴进行思维,运用归纳与演绎相统一的接受总则统率经验领域。形式逻辑与接受总则即构成了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

经验知识涉及的是名言之域,在冯契先生看来,认识并不限于经验领域,它同时指向性与天道,后者即是智慧之域。如果说认识论的前两个问题主要关联着经验知识,那么,智慧则更多地涉及认识论的后两个问题。就具体真理而言,其最高的形态可以归结为世界的统一性原理和发展原理,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即是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而关于道的真理性认识又内在关联着人的发展,后者便展开为自由的人格。冯契先生肯定,逻辑思维能够把握具体真理:人能够在有限中认识无限,在相对中揭示绝对,而这一过程即表现为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就对象而言,通过如上飞跃,自在之物不断化为为我之物;就主体而言,精神由自在而自为,自然赋予的天性逐渐发展为自由的德性,从而达到理想的人格。

知识所注重的是有分别的领域,它可以用名言来把握。就表达而言,知识是由命题(包括特殊命题与普遍命题)分别地加以断定,分别地作出肯定或否

定的判断,并以语句分别地加以陈述;就所表达(所知)而言,则是把对象区分为一件件的事实,一条条的定理,以把握事实和条理之间的联系,知识经验的领域即是以名言概念来区分的世界,无论是特殊命题,还是普遍命题,其真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冯契先生认为,与知识不同,智慧所把握的是有关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它的目标是求穷通,亦即穷究宇宙万物的第一因和人生的最高境界,揭示贯穿于自然、人生之中无不通、无不由的道,并进而会通天人,达到与天地合其德的自由境界。总之,智慧追求的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无限的东西,“这就是难以言传的超名言之域了”,而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便相应地意味着从名言之域走向超名言之域。

如何实现从名言之域的知识到超名言之域的智慧?冯先生从理性直觉、辩证综合、德性自证诸方面做了考察。转识成智的飞跃,旨在领悟有限中的无限,相对中的绝对,这种领悟往往是在顿然之间实现的,它表现为哲学上的理性直觉。理性直觉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它通过破而超越对待,通过立而揭示相对之中的绝对,由此达到天人、主客、能所的统一,而这一过程本身又实现于认识的无限的前进运动。通过理性直觉达到的领悟,必须以辩证的综合来论证和表达。冯先生区分了总名与达名,达名表示的是最高的类,总名所表示的是元学的理念,亦即大写的 Idea,总名可以看做是达名的辩证综合,如时空范畴便是达名,当我们说在有限中揭示无限,在瞬间把握永恒时,便是以时空范畴作辩证的综合,以表述超名言之域。与辩证综合相联系的是德性的自证。理性直觉与辩证综合的主体是我,我不仅有意识,而且能自证其德性,亦即对自己的德性作反思和验证,在言行一致的活动中自证其德性的真诚与坚定。

可以看出,从无知到知,又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既是知识论的问题,又是元学或本体论的问题;以广义的认识论为基础,冯先生对知识论与本体论作了沟通,并由此展示了统一本体与现象、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的独特思路。

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作为性与天道的理论,属于超名言之域。理论不能仅仅停留于形而上的层面,智慧学说在超越名言之域的同时,又要始终保持与知识经验和具体人生的联系。冯契先生以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概述了以上关系。化理论为方法,主要说明认识的辩证法如何通过逻辑思维的范畴,转化为方法论的一般原理。在《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中,冯契先生运用客观辩证法、认识论、逻辑相统一的观点,吸取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类、故、理等范

畴,建立了一个辩证逻辑的范畴体系。化理论为德性,则是指将认识的辩证法贯彻于价值领域,在实现真善美理想的过程中,培养自由的人格,在《人的自由与真善美》中,冯契先生对此作了深入的论述。这样,主体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中转识成智,又通过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而不断地向知识经验与现实人生回归,知识与智慧、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展开为一个基于广义认识论的动态统一过程。

冯契先生的以上哲学思考可以看做是对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反省,又表现为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回应。作为一种开放的体系,冯先生的智慧说当然并没有终结中国哲学,但它无疑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冯契“智慧”说探析》是王向清、李伏清合著的研究著作。本书的主要作者王向清教授近年一直致力于冯契先生哲学思想的研究,积累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基于这一研究前提,本书进而以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衍化为背景,对冯契先生的“智慧”说做了系统的考察,在理论分析和历史评价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推进冯契先生哲学思想的研究,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杨国荣

2012 年 7 月 3 日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智慧”说建构的动因	6
一、西方现代哲学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峙的驱动	6
二、对科玄论战的直接回应	21
三、实践唯物主义的指引	32
四、“智慧”说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峙的超越	35
第二章 由“无知”至“知”: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	40
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	41
二、知觉:感性认识的重要形式	50
三、普遍必然的知识何以可能	55
四、从认识起因看“无知”到“知(识)”的转化	68
第三章 “转识成智”: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	82
一、逻辑思维如何把握具体真理	82
二、如何把握天道	95
三、怎样认识自己	109
四、转识成智的飞跃	125
第四章 化理论为方法: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	133
一、化理论为方法概述	134
二、逻辑范畴及其方法论意义	138
三、辩证逻辑方法论的基本原理	154
第五章 化理论为德性:智慧与德性	175
一、智慧与自由	175

2 冯契“智慧”说探析

二、智慧与真善美的统一	187
三、智慧与理想人格的培养	211
第六章 “智慧”说对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219
一、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回顾	220
二、“智慧”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	245
三、“智慧”说对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249
第七章 “智慧”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	253
一、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53
二、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逻辑进程	255
三、“智慧”说对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贡献	262
第八章 “智慧”说对新儒学的超越	276
一、对梁漱溟直觉主义的批判	276
二、对熊十力“新唯识论”的反思	282
三、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扬弃	291
四、对未来哲学走向的影响	305
参考书目	315
索 引	318
后 记	329

导 言

一、冯契先生的生平和著述

冯契(1915—1995),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1915年,冯契出身于浙江省诸暨市;193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抗战爆发后,他曾赴延安,并辗转山西、河北等地,参加抗日工作。他1939年前往西南联大复学,1941年毕业。1941至1944年,在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他曾从学于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等著名哲学家。离开西南联大后,他曾任教于云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政治教育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名誉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第一届、第二届副会长,中国辩证逻辑学会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三届副主席,上海市哲学学会第五届会长。冯契毕生从事中国哲学史和哲学元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哲学界享有崇高的声望和地位。

冯契先生著述丰厚,其论著结集为十卷本的《冯契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6—1998年陆续出版。《冯契文集》包括“智慧”说三篇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三卷,《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卷,《智慧的探索》一卷(改革开放以后的论文汇编),《智慧的探索·补编》(改革开放以前的论文汇编),《哲学史讲演录·哲学通信》一卷。他主编的著作主要有《哲学大词典》和《中国近代哲学史》。

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冯契先生自觉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比较中西,兼容百家,对先秦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

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做了富有开拓精神和创建意义的提纲挈领式的勾勒,撰成了三卷本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一卷本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种著作,终成一家之言,对建构科学的中国哲学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了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体系,侧重于揭示中国古代哲学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二是从广义认识论角度论证了中国传统哲学蕴涵的丰富的认识论,以回击所谓中国传统哲学“重人生轻自然、长于伦理而忽视逻辑”的流行之论,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对中国传统认识论和自然观的理解;三是提出并论证了中国近代经历的一场哲学革命,力图揭示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型的内在根据。

在哲学元理论方面,冯契先生的主要贡献便是超越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峙,克服了人生和科学的脱节,找到了知识转化为智慧的途径,构建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中国气派的“智慧”说哲学体系。这一体系就是由《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与《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构成的“智慧”说三篇。

冯契先生是一位大器晚成、非常严谨的哲学大家,生前只出版了哲学史方面的著作和《智慧的探索》这本改革开放后所发表论文的汇编,关于哲学元理论方面的“智慧”说三篇是其逝世后的1996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实际上,冯契先生的“智慧”说三篇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完成初稿,并且出了油印本作为研究生的教材。笔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1987级逻辑学专业研究生,所用的辩证逻辑教材便是《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的油印本。据了解,1985、1986级逻辑学专业研究生的辩证逻辑教材也是《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的油印本。之所以没有交付出版社正式出版,是因为冯先生认为书稿中还有不成熟之处,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这一完善过程竟持续了十余年之久,可见他对学问的执著、严谨,不急功近利。正因为如此,在哲学界,冯契在生前基本上是以哲学史家的身份出现的。随着“智慧”说三篇的问世,学术界才渐渐了解到:冯契不但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哲学史家,更是一位哲学理论家;他研究哲学史,主要是为研究哲学元理论做准备。

对于冯契先生的学术成就,学术界给予充分的肯定。

萧蓬父先生认为,冯契的“晚年会心之作《智慧三书》,自成体系,巍然卓

立,实神州慧命之延续,当代学林之楷模”^①。

方克立教授对冯契先生建构的“智慧”说哲学体系给予了高度评价。“冯契先生的智慧学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力图解决知识如何发展成为智慧,如何实现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如何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问题,也就是说,力图克服科学与人生、知识与智慧的脱节,克服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不论他是否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个努力的方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②

汤一介教授于2006年5月15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的文章,认为中国现代哲学学者在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呈现出“三个‘接着讲’”:一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二是接着现代西方哲学讲;三是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在他看来,冯契是一位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在充分吸收和融合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分析哲学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三说》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辩证法、西方的分析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较好地结合起来的尝试。冯契不仅是“照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是“接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把中国哲学思想和中国哲学问题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

2010年2月24日,哲学专业网站《哲学在线》发表了一篇题为《冯契——中国“打通中、西、马”的第一人》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学术界确实有一位算得上“打通中、西、马”的哲学家,就是已故的冯契先生。中国20世纪哲学家中,努力“打通中、西、马”的人不算多,成功者更为罕见,但冯契先生显然是一位成功者。冯契先生熟练运用“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深入探寻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并且在“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基本要素,建构了“智慧”说的哲学体系。

“搜狐博客”发表了一篇题为《读书就读“冯契”》的文章,高度评价了冯契先生在20世纪中国哲学界的地位。文章认为,当代一位知名学者曾说过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没有人比冯契更有中国哲学的造诣了”这句话,十分恰当地概括了集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于一身的冯契。文章指出:“与世

① 萧篱父:《理论方法德性》,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② 方克立:《方克立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0页。

纪初那个令人神往的精神时代相比,20 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哲学界,似乎已经很黯然了。大师既去,似乎在全民商化的浪潮里,再也难以看到思想的浪花欢快地跃动了。虽然偶尔也会有一两颗晶莹的水珠在浪尖一闪,可是在倏忽间就已归于寂灭了,这多少会让人觉得有点落寞和伤怀。人们似乎已然失望了。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 80 年代。当冯契将他的《〈智慧说三篇〉导论》先期发表出来的时候,尘封已久的中国学术界那沉闷的氛围开始有了一丝萌动的生意,人们才发现,原来在寂寥的思想暗夜里,依然还有如此富有原创力和智慧内涵的思想火光在幽幽地燃烧着。”文章将冯契的“智慧”说看做哲学研究突破“左”的思维教条和僵化模式的开山之作、启蒙之作、导航之作,正是它的自由思考和鲜明的个性特点,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哲学界,催生了哲学研究的自由创造和多元化。

正因为冯契先生对 20 世纪中国哲学作出了突出贡献,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在他逝世不久,就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二、国内外冯契哲学思想研究现状

学术界对冯契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于其逝世的 1995 年 3 月后,迄今为止,《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哲学动态》、《学术月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吉林大学学报》、《湘潭大学学报》、《高校理论战线》、《现代哲学》、《求索》等学术刊物发表了研究冯契先生哲学思想的论文三百多篇。海外的英文杂志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等也发表了数篇研究冯契先生哲学思想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以冯契先生的哲学思想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有二十多篇。而以冯契先生的哲学思想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有:《人的成长和人格理想——冯契智慧说与霍韬晦如实观之比较研究》,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李锦招;《冯契自由理论研究》,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林孝瞭;《论冯契的实践观》,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张志军;《论冯契的理想学说》,作者为湘潭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余华。公开出版的研究冯契先生学术思想的专著有:《冯契辩证逻辑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彭漪涟教授;《化理论为方法、化

理论为德性——对冯契一个哲学命题的思考与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彭漪涟；《冯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湘潭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作者为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向清。出版的论文集有：《理论、方法和德性——纪念冯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编，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版；《知识与智慧——冯契哲学研究论文集》，杨国荣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追寻智慧——冯契哲学思想研究》，杨国荣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透过上面列出的冯契哲学思想研究成果名录和笔者的阅读，不难发现过去的研究存在以下缺失：一是没有从整体上、宏观上全面、系统地考察冯契的“智慧”说。上面所列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和三本专著选题，只是对冯契先生“智慧”说的某个方面、局部进行解读，而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而那些没有列出题名的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由于篇幅小，就更难以作出全面、系统的考察了。换言之，已有的研究成果，尽管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都是从某个侧面展开的，还处于分析研究的阶段，体现出不系统、不全面的缺失，缺乏宏观、整体的把握。二是没有注意从比较的角度研究冯契的“智慧”说。“智慧”说的建构，当然与冯契先生的学养、师承有关，但更与哲学的内在发展相关。在 20 世纪中国哲学史上，不少哲学家试图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以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将冯契的“智慧”说与 20 世纪中国的其他哲学家建构的哲学体系进行比较研究，以彰显其特点和不足。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有的学者已注意从纵向进行比较，即将冯契的“智慧”说与熊十力的新唯识学、金岳霖的新道学、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说等进行比较，但鲜有人将冯契的“智慧”说与同代哲学家的思想进行比较。上述缺失的存在，表明有必要对冯契的哲学思想进行更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

第一章 “智慧”说建构的动因

冯契曾指出：“我们可以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吸取实证论、非理性主义的合理因素，用中国传统智慧（近代化了的）来科学地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在改变世界和发展自己的统一中使哲学达到一种新的更高的境界。”^①他一生致力于智慧说的建构，其中有着深刻的动因：首先，深受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影响，是在西方现代哲学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峙的驱动下萌芽的；其次，是科玄论战余音的延续，是对科玄论战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峙的直接回应和深刻而又自觉的反思；最后，其理论的成功建构更有实践唯物主义的指引。正是诸多的动力因素，加上冯契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而对时代课题不断进行反思和省察，才有了广义认识论的诞生，从而以其智慧说超越了持续半世纪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峙，实现了知识和智慧的相互交融。

一、西方现代哲学科学主义与 人文主义对峙的驱动

冯契先生在《〈智慧说三篇〉导论》之《时代问题》中曾指出，他在哲学领域真切感受到的知识和智慧说的关系问题的时代意义，就在于西方近代哲学中以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传统和以孔德、穆勒以来的实证论、科学主义传统之间的对峙，并认识到这种对峙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在继续发展。可见，其智慧说的理论驱动力，首先来自于西方近现代哲学以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峙。因此，我们要真正理解冯契的智慧说，必须理清西方现代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峙的大致进程。

^① 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页。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峙确立的第一个阶段是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阶段,这一阶段围绕着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扩张这一现实的时代需求,就如何发展科学的时代主题展开为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辩。但这一争论都是通过对传统亚里士多德式思维方式和经验哲学的批判来实现的,因此,仍与西方广义的理性主义或认知主义传统不可分离。正如丹尼尔·贝尔指出的:“理性判断一直被认为是思维的高级形式,而且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近两千年。”^①而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那里,甚至赫拉克利特那里。可以说,古代及中世纪本体论哲学重在把握外在的客观实在,而近代认识论哲学则重在把握我们的心灵如何把握实在,这种转向我们称之为“认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为反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教条,颠覆性地击败中世纪以来的教会权威,培根和笛卡尔分别从认识的感知和认识的理性的角度建构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成功引导了西方近代认识论的转向,呈现出西方近代哲学中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对峙的风景。^②

培根在批评亚里士多德“理性派哲学”的基础上,即破即立,强调认识的感知的一面,发展了经验归纳逻辑,在英国开创了经验主义传统。他在《新大西岛》中描述了一个科学技术主宰一切的理想社会,并力图借助在实验基础上进行归纳的方法,即经验归纳法的“新工具”来取代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工具,同时引导自然哲学从古代“解释自然”向近代“如何解释”的主题转向,即哲学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培根的经验主义哲学是从批判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开始的,但他开创的这个哲学派别本身又蕴涵着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因子,尤其是其“四假象说”直接表明了感觉经验之不可靠性、不确切性。而“反例”归纳说和筛选说表明,他已觉察到从经验归纳中得来的原则、公理的可靠性带有两面性,即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从而直接推进了科学方法中怀疑论的发展。这些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因子经过霍布斯之物体性质之两种“偶性”说、洛克

①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傅铿编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

② 关于这点,请详细参考由王树人和叶秀山总主编的八卷本《西方哲学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之第四卷“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周晓亮主编)之上篇大陆理性主义篇中的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认识论思想,以及中篇经验主义哲学篇中的培根、霍布斯、洛克、巴克莱、休谟的哲学思想,其书都作了系统而详尽的阐述。